

## 有關知青文學話語質疑的思考

### ——為知青文學一辯

◎ 王力堅

自上世紀70年代末文學春天來臨之時起，一直到現今，活躍於中國文壇的作家不少是當年的知青——如孔捷生、蕭復興、甘鐵生、張承志、梁曉聲、陸星兒、陳可雄、鐘阿城、葉辛、張抗抗、張曼菱、喬雪竹、史鐵生、王小鷹、趙麗宏、韓少功、王安憶、陳村、鐵凝、竹林、鄧賢、郭小東、鄭義、徐乃建、蔣巍、老鬼（馬波）、舒婷、王小波、趙瑜等等，在他們的筆下，知青題材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視，「知青文學」也因此成為中國新時期（上世紀70年代末至今）文學不可忽視的一支生力軍。然而，近年來關於知青文學話語問題，卻頻頻出現了質疑、非議的聲音——包括知青代群內部話語權的質疑，知青代群外部話語權的質疑，以及知青文學懺悔意識的質疑。

上世紀90年代，人們對知青文學話語權的運作產生了興趣，並頗為尖銳地指出知青文學話語權被知青代群中的成功者所擁有，知青文學的話語言說其實只是成功者的聲音而並不能代表整個知青代群。這種意見隨著知青運動30周年紀念活動的開展而愈見激烈，較有代表性的便是曾是老三屆知青的徐友漁在〈知青經歷和下鄉運動——個體經驗與集體意識的對話〉中的指責：「一種部分人擁有的，有時甚至是虛構的集體意識代替了每個個體的親身經歷和獨特經驗。」「成功者自覺不自覺地把自我經歷和自我意識投射放大，編造和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相類似的神話。……他們並沒有撒謊，但僭取了『我們』這個名義。」<sup>1</sup>因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三十周年紀念而推出的大批知青名人回憶錄更進一步激發了這種指責，《中華讀書報》就連續刊發了有關文章批評：「老知青中一部分『成功人士』的回憶錄及雜感匯編，知青作家自選集等，範圍有限，不容易體現知青文學的全景與實績。」<sup>2</sup>「知青名人們在上山下鄉運動三十周年之際，紛紛以自傳性文體發言，不僅缺乏深刻思想內涵和歷史份量，連對歷史的再現也局限在一己的經歷中。」<sup>3</sup>「正由於這種人為造成的歷史失真，給下一代造成錯覺和迷茫，誤以為知青一代的成功與輝煌和苦難與汗水有著必然的相關關係，更誤以為當年的知青今日大部份都是『中流砥柱』。」<sup>4</sup>

的確，這些知青作家名人，畢竟只是知青代群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知青是「失語」的、「無語」的，而他們恰恰就是至今仍然在社會底層掙扎求存的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對當年知青歷史的體驗與認識跟知青作家名人大約不會一樣的。因此，從整個知青代群來說，「話語

權」倘若只是集中在知青作家名人手中，而他們的言說也都僅囿於「一己的經歷」，確實難免會令知青文學的發展陷於「話語失衡」的困窘之境。

那麼，消解之途何在？

首先，解鈴還須繫鈴人——知青作家。這些知青作家不僅是當今文壇的名人，更是當年知青歷史的親歷者；不僅對知青生活有深摯的緬懷與回味，還應有更為深刻的領悟與思考。因此，倘若他們跳出自我的沉溺、擺脫個人的偏執，他們對知青歷史的敘述言說，便當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話語失衡」的困窘。事實上，吉林人民出版社為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三十周年紀念推出的《老三屆著名作家回憶錄》叢書，包括陳建功的《十八歲面對侏羅紀》、高洪波的《也是一段歌》、趙麗宏的《在歲月的荒灘上》、蕭復興的《觸摸往事》、陸星兒的《生是真實的》、葉辛的《往日的情書》、賈平凹的《我是農民：在鄉下的五年記憶》、張抗抗的《大荒冰河》、王小鷹的《可憐無數山》、畢淑敏的《在印度河上游》、范小青的《走不遠的昨天》以及葉廣芩的《沒有日記的羅敷河》等十多部，其中雖然也有溺於偏執者如賈平凹的《我是農民：在鄉下的五年記憶》<sup>5</sup>，但其餘中確實不乏可稱「是在講述一代人、二代人甚至三代人的坎坷經歷，是在講述著共和國『那個年代』的苦難。他們沒有濫用別人所不擁有的發言權，來自我標榜自己的奮鬥史。」<sup>6</sup>儘管如此，絕對數量上的劣勢，致使知青作家在消解「話語失衡」上的效果十分有限。因此，要有效消解知青代群「話語失衡」的困窘，還須調動起知青代群中的沉默的大多數。雖然這個工作的實施還須極大地加強，但畢竟也已經開始操作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這體現在大量「小敘述」的知青回憶錄及知青網絡文學的出現。

北京學者徐友漁說：「這些『小人物』、不幸者的坎坷經歷和心酸史，是很難出現在知青主編的回憶錄、採訪錄中的。幸好，有幾個電視節目還給了這類人一些出鏡機會，我們由此才了解到還在城市最下層中苦苦掙扎的知青，在黃土高坡或南疆邊寨已完全同化於農婦的前女學生。」<sup>7</sup>湖北作家劉醒龍也說：「北大荒50年代的老兵團戰士與上山下鄉的知青是甚麼關係？至今沒有看到他們的話語，同樣，像大別山區，大量的知青去了，但也沒有發現知青的話語里有對你們發自內心的評價。」<sup>8</sup>這些指責雖然不無道理，但並非能全面反映現實情況。事實上，90年代，隨著「知青熱」的興起，紀實性的知青文學<sup>9</sup>便已成為中國文壇一道耀眼的風景線，而其參與者已不僅限於專業（知青）作家，還包括了人數眾多從事各行各業的當年知青。這些出自非專業作家之手的紀實性文學，大多從個人角度記述知青上山下鄉的生活經歷，由此折射出知青代群（及運動）在中國當代歷史長河中的命運及意義。這一現象，無疑突破了知青專業作家唱「獨角戲」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沉默的大多數」的聲音，形成知青文學話語民間化的可喜局面。然而，「非專業性」的局限，以及「市場號召力」的尷尬（缺乏），致使他們的話語權行使往往是處於被動且非活躍的狀態。

知青話語民間化更令人振奮的表現是知青網絡文學的悄然興起。知青網絡，指管理者以及參與者皆以當年知青為主體，而其內容也與知青話題有關的網站與主頁。知青網絡大約形成於90年代中後期，目前可統計的知青網站/網頁大約有一百一十多個<sup>10</sup>，其中較活躍的知青網站有「華夏知青網」、「老三屆」、「老知青之家」、「承德知青網」、「老知青網」、「知青網」、「兵團戰友」、「知青緣」、「北大荒」以及「美國南加州中國知青協會」等。所謂知青網絡文學，即指當年的知青（及其有關者如其後代與親朋戚友等）在知青網站、網頁以及其他綜合網站上發表的原創作品（網上習慣稱為「帖子」）。從內容上來說，知青網絡文學涉及的面較為廣泛，既有回憶當年知青在農村、農（林、牧）場、生產建設兵團的往

事，也有表現他們返城以後乃至目前的生活，以及對各種社會現狀及問題的反映及感受。知青網絡的網友不少就來自社會中下層包括退休及下崗人士，他們的帖子，能較大幅度反映了知青中的「大多數」的歷史、現實與心聲。如蟲二的《留在湖區的女知青》敘述了「用自己終生不逾的行為，證實了自己當年對組織發出的誓言」的M，「超越巨大的身份、經歷的鴻溝」與農民結合的坎坷一生<sup>11</sup>。呼倫河的《離別三十年，今日回內蒙》訴說重返插隊舊地的感受：「在那已經遙遠了的整整五、六年的時間裏，我們與這裏互相屬於，互相見證，生命留在了這裏（不管它是苦是甜），感情自然也就留在了這裏。這樣說，絕不是矯情和故做姿態。……人活著，誰也不願意去追求苦難，但是沒有經過磨難的生命，肯定是輕飄飄的。」<sup>12</sup>老城的《我的同學小周》則描寫了90年代初才從陝北回到北京而又很快就下崗的老知青小周，「樂觀豁達，淡泊名利，坦然處世，直面人生；對於現實生活，他從不回避，從不攀比，從不抱怨，從不仇視」，儘管家境困難，仍然熱情招待知青朋友到家里聚會，「他好客的婆姨為我們包餃子，做陝北菜，大家吃、喝、玩得十分盡興。像當年一樣，小周微笑地看著我們折騰，臉上帶著令人心悅的熱情、坦誠和滿足。」作者由衷感嘆道：「一個普普通通的下崗工人，哪里來的這份磊落的襟懷和博大的氣度？小周是小人物，但他是中國知青的脊梁！」<sup>13</sup>身為教師的林子在《曾為知青》的帖子中寫道：「忽忽到了一日，與學生在中學實習，無意中翻到一個班的學生履歷表，赫然發現，父母職業欄中，頻頻出現著同一個詞：下崗，下崗，雙雙下崗。心中一下子惶惶亂亂，急急又翻回頭，尋找著他們的年齡欄……沒錯！就是這個年齡！就是曾為知青的年齡！就是我的同一代人！！即刻悲從中來，淚流滿面……從此，便只有沉重，只有分分秒秒的追趕，怕的是自己還來不及將這一代人的歷史，更詳盡更真實地告訴女兒和學生，即便那一開口一下筆，句句蘸淚，字字泣血，就像在將生命一點一點地耗在裏面。我不後悔，我的活著，不再屬於我自己。因為，我曾為知青。」<sup>14</sup>知青後代「我是誰？xju3387」於《老三屆論壇》發表的帖子《我的爸爸媽媽》，描寫了其「都是67屆畢業下放的」老知青父母的愛情故事，「曾經苦難的共同經歷成為了他們相識相愛的見證，也順帶著成了家里教育孩子最好的教材」，至今依然「留在了江西這片紅土地」的父母，「還經常在回憶那段艱難困苦的被他們那代人稱之為『蹉跎歲月』往事和想念那些至今仍住在鄉下因長期從事農業生產而過早白了雙鬢的戰友們」<sup>15</sup>。

這些知青網絡文學是知青文學發展史上，迄今為止最具開放性與自由度的話語空間，也是最具現實意義的民間文本或最具民間立場的知青敘事<sup>16</sup>。然而，由於經濟上（電腦及上網費用）與技術上（電腦網絡技術）的原因，文化水平低、經濟收入低的「沉默的大多數」依然無法大量登錄上網，知青網絡文學的發展也因此頗受限制。無論如何，這些非作家的知青回憶錄及知青網絡文學的出現與存在，對於知青文學發展確實是起到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這種民間化的知青敘事話語，與其說是對知青專業作家話語（尤其是所謂名人回憶錄）的反動，不如說是從「小敘述」角度對知青歷史「宏大敘述」進行了不無裨益的「補白」，與知青專業作家的話語（回憶錄）相輔相成，使知青文學的紀實性話語體系得到較為完整的建構。知青文學創作的代群「話語失衡」，也從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但是也不得不指出，不管承認與否，作為專業作家，知青作家名人畢竟掌控著最具效率、最具影響的話語權，而自覺或不自覺地、自願或不自願地充當了知青「代言人」的角色，正所謂「歷史往往由強者書寫」<sup>17</sup>。因此，知青話語權的天平仍然是傾向於他們，知青代群內部文學話語失衡的困窘局面，仍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

如果說人們在談論知青代群內部的「話語失衡」時，語氣還算溫和的話；那麼，當談論到知青代群外部的「話語失衡」時，語氣卻是嚴厲多了，最有代表性的便是當下風頭頗健的文學批評家王彬彬的指責：「從最初的『知青文學』到眼下五花八門的回憶文章，都出自當年的『知青』之手，都只能說是一種『知青話語』。當年的『知青』們，作為完成了『知青運動』的一半，壟斷著關於這場運動的全部話語權。「在『知青話語』中，『知青』總是主體，而農村和農民則只能是客體，被置於受打量、受審視的境地。」<sup>18</sup>「所謂『知青運動』，是城市青年與農民共同完成的。因此，當年的農民對『知青運動』和『知青生活』也有一份發言權。但迄今為止，並沒有農民的聲音。只聽見『知青』在單方面地說個不休，他們說著當年的自己，也說著當年的農村和農民。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表現了『知青』的話語霸權。」<sup>19</sup>

王彬彬對「話語失衡」的討論重點轉移到知青代群以外，提出農民不受重視，強調知青與農民的互動關係，這些都不失為有建設性的見識。然而，他將農民話語權的失落歸咎於知青，甚至由此推導出一個所謂「知青話語霸權」的結論，卻是體現了頗為偏執的情緒。平心而論，雖然不能否定知青與農民的互動關係，但知青無疑是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主體或主角，他們（無論是整體或個體，自願或不自願）是全程、全身心地投入參與這一運動的，而農民（尤其是個體）則多少有些游離狀態，因此，知青對這一運動的回顧、探討的關注與參與的熱誠態度，是不可能出現在農民身上的。此外，農民不擁有「話語權」，除了缺乏知青那種「主角意識」外，還確實有文化程度相對低下的原因，而相反，知青的文化程度普遍較高（跟農民比較），這也是他們能擁有「話語權」的一個外在因素。這裏我們並沒有（也沒必要有）歧視、埋怨農民的意思，只是表明一個客觀事實。而且知青在使用他們自己的「話語權」之際，並沒有（也根本不可能）將農民的話語權「壟斷」、「獨霸」，因此，確實不能無端冠一「霸」字而稱之為「知青話語霸權」。換個角度說，即使農民不行使其「話語權」，知青也不應該噤聲不語，以示「平等」。

王彬彬大約對此也有所認識，因而在抨擊「知青話語霸權」之餘卻又不無自相矛盾地承認：「『知青』當然並非蓄意要壟斷關於『知青』的話語權。農民本就沒有話語能力，陳述這一歷史事件的使命，也就只能由『知青』單方面承擔。這使我想，有多少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都只留下了一面之辭。」<sup>20</sup>農民在陳述知青歷史上的「話語失衡」確實是一大遺憾。為了彌補這一遺憾，或許可以發動當年的農民（及其後人），以文字或口頭（錄音）的形式，記錄下他們對知青、知青運動及知青歷史的看法與認識。也或許正是基於同樣的想法，王彬彬以「一個鄉下人」（其實當是「前鄉下人」或「鄉下人的後代」）的名義，撰寫了一篇針對性甚強的回憶錄《豈好辯哉：一個鄉下人對「知青」的記憶》。文中處處凸現知青與農民的緊張對立關係，認為「『知青』與農民的關係，實質上是一種欺負與被欺負的關係」<sup>21</sup>。基於這種認識，該回憶錄刻意「揭露」知青戲弄、欺凌農民的情形，還不無揶揄地說，知青帶給農村「最值得一提」是「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罪」，以顯示知青下鄉意味著「將農民以及所有鄉下人都置於了一種被欺負的境地」<sup>22</sup>。王彬彬的回憶錄頗為充分地展示了其實有的犀利酣暢的文風，然而，其以偏概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做法實在令人難以苟同。

無獨有偶，知青的同時代人，專業一級作家劉醒龍在〈爛漫是希望的一種——答丁帆〉中宣稱「放棄所謂知識分子的立場，而站在普通人甚至農民本位的立場發出一種讓人刺耳的聲音」，這種聲音便包括了對「知青情結」的批判：「現今的文學中有一股太重太濃的『知青



情結』，近期的『知識分子情結』實際上是『知青情結』的一次翻新。我不喜歡『知青情結』，甚至還有些反感。最近我看了一場知青晚會，整個的是一種知青下鄉是受罪，鄉下人祖祖輩輩受罪則是活該地鼓噪。在『知青情結』中，他們總是在審視那祖居在知青點周圍的粗俗怪人，總在尋找著批判的靶子，而在潛意識中湧動著的是尋找將他們攆到鄉下去的社會與歷史的根源。我這麼說不少人會不高興，但他們可以努力地將自己的舊作新作翻看一遍，看是否可以找到對昔日鄉鄰與土地的深情融合。」<sup>23</sup>由此看來，劉醒龍對知青文學中的「知青情結」確實是反感到「刻骨」程度了，以致口不擇言地大加鞭撻。我實在難以想象哪一場知青晚會會對劉醒龍有如此大的刺激，我也難以想象在當今現實中會有那麼一場「整個的是一種知青下鄉是受罪，鄉下人祖祖輩輩受罪則是活該地鼓噪」的晚會<sup>24</sup>。至於將「審視那祖居在知青點周圍的粗俗怪人」，「尋找著批判的靶子」與「尋找將他們攆到鄉下去的社會與歷史的根源」聯繫起來，也是很有些令人莫名其妙的。那些「粗俗怪人」不至於是「批判的靶子」吧？更不至於是「將他們攆下鄉去的社會與歷史的根源」吧？劉醒龍的思路及表述方式也委實是詭異了些。張承志的《黑駿馬》、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鐵凝的《村路帶我回家》及張曼菱的《有一個美麗的地方》等知青小說，正是由於「對昔日鄉鄰與土地的深情融合」的出色描寫而得到文壇乃至整個社會的公認<sup>25</sup>。若說作為專業一級作家的劉醒龍會不知道，是很令人納悶的。

劉醒龍的中篇小說《大樹還小》，或許就是基於上述判斷的先驗性創作。該中篇小說敘述了以白狗子為首的一群老知青，為了編寫紀念知青上山下鄉三十周年晚會節目，重回下鄉地「感受一下，尋找一些靈感」，因而重新挑起了與當地農民秦四爹及小樹一家糾纏不清的恩怨情仇。小說有兩個「亮點」：一是對知青的全盤否定，二是凸顯放大知青與農民之間的矛盾對立及不平等。<sup>26</sup>作者借秦四爹的口罵知青：「那些家伙不是家伙！」借農家小孩大樹之口評價知青：「我很小的時候，總聽坑裏的人在說知青沒有一個好東西，好吃懶做，偷盜扒拿不說，還將坑里的年青人帶壞。」「自從來了知青後，這兒的流氓就大膽多了，像是有人撐腰似的。」<sup>27</sup>這種以偏概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地全盤否定知青抹黑知青的做法，跟王彬彬所為如出一轍<sup>28</sup>。為了證明知青的「壞」，作者就刻意凸現知青與農民之間的矛盾對立與不平等現象。小說的主線就是農民秦四爹與知青（以白狗子為首）的矛盾衝突：在白狗子等知青的「陷害」下，秦四爹被以「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罪」（強姦女知青）判處坐牢三年，由是毀了一生。在作者的理念中，白狗子等知青們之所以要「陷害」秦四爹，是不能容忍他跟女知青文蘭相好，是一種城裏人瞧不起鄉下人的優越感作祟。這也恰好「印證」了王彬彬所說的「『知青』與農民的關係，實質上是一種欺負與被欺負的關係」（見前）。說到底，這些矛盾衝突與對立都是源於知青與農民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小說通過大樹的口抱怨：「為甚麼要喜歡知青？」「你們知青可從來沒有喜歡過農村。」「老師在課堂上提過知青，說他們老寫文章說自己下鄉吃了多少苦，是受到迫害，好像土生土長的當地人吃苦是應該的，他們就不應該這樣。」<sup>29</sup>在關於小說《大樹還小》的訪談對話中，劉醒龍也表白：「知青也好，農民也好，他們的命運其實都是後來造成的，但在社會的習慣思維中，這些仿佛是先天就決定了的……我強調我的小說只是在這一點上提醒人們，上帝是仁慈的，是以平等仁愛之心善待每一個人的。」<sup>30</sup>

知青與農民之間確實存在著不平等，但不能因此就斷言知青與農民之間的關係是絕然對立的、是欺負與被欺負的關係。首先，知青中的確有醜惡的人與事，但因此就絕然否定知青整體總是說不過去的。同理，農民中（尤其是農村幹部中）也存在迫害知青的現象，我們也並

不能因此就否定農民整體。劉醒龍聲稱「以平等仁愛之心善待每一個人」，他如此全盤否定、抹黑知青很難說得通是「以平等仁愛之心善待每一個人」。打壓知青也很難說就表示是對農民的「平等」。其次，知青與農民之間，知青也並不總是佔「優越」地位——尤其在政治上。由於「接受再教育」的「緊箍咒」，以及招工招生必須經過當地農民尤其是農村幹部的推薦與審批，知青往往就無法「挺起腰杆做人」，知青文學中所反映的知青受迫害的事情並非憑空虛構，所謂「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罪」就是由於知青受到迫害之後才出台的法令，旨在保護知青的人身安全，至於在實施過程中成為知青與農民之間的「鴻溝」，應當不是普遍現象，更不可能成為知青「欺負」農民的手段。因此不宜簡單否定這一法令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就好像我們提倡人人平等，但並不防礙要制定保護婦女與兒童法令一樣，畢竟知青在當時還是屬於弱勢群體（即使跟農民相比較——尤其是數量上）<sup>31</sup>。

#### 四

由於歷史的原因，知青與農民在社會文化上的不平等確實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這種不平等的責任決不應該由知青來負。而且，不平等絕對不應該、事實上也並沒有導致知青與農民之間全面勢不兩立、尤其形成所謂欺負與被欺負的關係。其實，知青與農民都是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受害者，雖然知青當年下鄉大都出於被迫、無奈，而知青也因此遭受了難以言喻的苦難，他們跟農民之間也曾發生過不愉快的事情，但無疑也因此有機會對農村與農民有較切身的了解，並與農民與農村結下了頗為和諧且深摯的關係，相互之間關心幫助的實例不勝枚舉。知青文學中此類表現並不少見，如前面說過的張承志、史鐵生與鐵凝等的小說中，便有頗為充分的反映。就以知青網絡文學來說，麻卓民、老例、叢玉文、柏萬青、西北狼1號、南國嘉木、春雷、王勤、老城、號子等人的帖子都反映了他們跟農民、鄉村之間儘管有城鄉文化差別但仍然融洽無間、感情真摯的關係。如麻卓民對放牛娃板弓的牽掛<sup>32</sup>、老例對房東一家的懷念<sup>33</sup>、叢玉文追憶跟山區少女生死不渝的師生情誼<sup>34</sup>、柏萬青忘不了江西老表濃濃的鄉情<sup>35</sup>、西北狼1號與老農張大伯的「忘年之交」<sup>36</sup>、南國嘉木與村姑華姐的「姐妹情深」<sup>37</sup>、承德知青對「故鄉」（下鄉地）「養育之恩」深切感戴<sup>38</sup>、兵團戰士對草原「精神家園」夢縈魂牽<sup>39</sup>。老城的《回延安》，記述與分別三十多年的農民老房東重逢，房東大嫂「從衣櫃裏捧出一個衣衫襤褸、胳膊用鐵絲拴著，鞋只剩一只，臉髒兮兮的塑料娃娃」——那是作者三十多年前送給房東女兒的禮物。作者為之深深感動：「將一個被沒有玩具的孩子時刻惦記著的娃娃保存到現在，那是要怎樣的上心啊！」<sup>40</sup>號子的自述或許更有代表性：「我下鄉的時候從不敢穿亮色的衣服，那套褪色的學生裝穿了洗，洗了穿，可和農民比起來還是天遠地隔。……我們飽嘗了最底層的生活，更懂得平凡人們中的苦酸。」<sup>41</sup>這些平實無華的敘事中確實體現了知青與農民在文化上的不平等差距，但彼此間的相互了解和魚水深情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倘若說這只是知青的「自說自話」，那麼請看農家後代對知青的印象——程美信在〈我記憶中的知青〉一文裏，既寫了知青在農村打架鬧事，也寫了鄉親對知青的體諒關照，同時更著意描寫了知青衛平與村民的親密交往及深厚感情：「他對我那家鄉的感情非同一般，那片土地裏埋有他的青春年華，同時還有他的情誼世故。」<sup>42</sup>石城大俠在《山花祭》中，記述其妻子（黃山茶林場「土生土長」的姑娘）：「少年時向往外面的世界，對那些比她年長的大哥、大姐們的好感是不言而喻的。也許正是受了他們的影響，她才能從這片深山老林中振翅飛出吧。」<sup>43</sup>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飛行員Peter在致《華夏知青網》「斑竹」（管理員）的信中表示：「我理解並了解你們那段生活，我的童年是與知青生活在一起的，在東

北的興凱湖農場十五連，不管人們怎樣的評價那段歷史，我始終對知青的貢獻是肯定的。我的小學、初中老師都是知青，是他（她）們給了我知識。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忘不了那時的生活……」<sup>44</sup>由此可見，劉醒龍在小說《大樹還小》中，刻意渲染農民及農民後代對知青的敵視態度，確實是有誇大其詞之嫌；至於攻擊知青「老寫文章說自己下鄉吃了多少苦，是受到迫害，好像土生土長的當地人吃苦是應該的」的說法，也實在是有強詞奪理之嫌——知青訴苦怎麼就可以推斷為「好像」說農民吃苦是應該的呢？倘若說農民吃苦知青也應該吃苦而不許訴苦才算平等，那就更實在是無視現實存在的苛求或可說是空想共產主義的囈語了。畢竟，「知識青年這一代人始終生活在話語權力不平等的社會，生活在（哈貝馬斯意義上的）交往行動自由遠未實現的文化氛圍中」<sup>45</sup>。

王彬彬曾不無遺憾地說：「當我寫〈「知青」的話語霸權〉這篇短文時，我尚未讀過劉醒龍的小說《大樹還小》，不然我可以為自己的想法找到一種有力的佐證。」<sup>46</sup>我真為王彬彬捏了一把冷汗，幸虧王彬彬沒有將劉醒龍的《大樹還小》當作佐證——別說該小說在學理上站不住腳（見上所論），就從創作及藝術角度看也同樣是經不起推敲的。首先，劉醒龍的《大樹還小》就是所謂「主題先行」、「為文造情」的產物。在〈由《大樹還小》引發的對話〉中，訪者問劉醒龍：「你在創作中似乎並不介意主觀的參與，甚至有意要讓作者的意圖透過人物、透過結構、透過情節和細節露出痕跡來……在你的印象中早就對『知青』另有一種評價，它不同於已有的『知青文學』中的自我評價；你渴望將它形象地表達出來，於是就虛構了這樣一個故事。」<sup>47</sup>劉醒龍默認了這個說法，並補充道：「我對現實的關注，確實有很大的主觀性，這一點是由自己的心靈決定的。」<sup>48</sup>同時，對他所認為的「整個的是一種知青下鄉是受罪，鄉下人祖祖輩輩受罪則是活該的鼓噪」的知青晚會的反感，或許也就是他創作《大樹還小》的直接觸因<sup>49</sup>。正是由於這麼一種帶有偏見的先入為主的「主觀性」引導，既沒當過知青，也沒當過農民的專業一級作家劉醒龍虛構了這麼一部不管在主題還是情節或細節都漏洞百出的小說。如上所析，該小說的全盤否定知青、凸現知青與農民尖銳對立的主題只能說是故作驚人語，而支持主題的情節及細節乃至人物塑造更是「虛構」得令人啼笑皆非，如身為大隊長的秦四爹三頭兩天往公社跑，要招工指標，甚至還可以用一包煙從鄰近大隊的大隊長那裏換來返城指標，為的是「優先」送走「最搗蛋」的知青，以求鄉村「多一份安寧」。當過知青的人，打死也不可能想到會這麼一種招工離開農村的方式。又如秦四爹為了將知青與農民隔離，讓知青花兩個冬春去挖一個「戰備洞」——想必夏秋也是挖洞不止，否則夏秋農忙之際知青是很難不跟農民打照面的。在華中腹地山村挖「戰備洞」的荒誕意義雖然不宜深究，但確實可以避免對諸多「技術性」的農村生產與生活細節的描寫，這一書寫策略，大概也只有沒當過農民的一級作家才能設計得出<sup>50</sup>。至於秦四爹為了給知青「一個教訓」而安排的「戰備洞塌方」，居然能有驚無險、恰到好處地深埋16位知青（「整整刨了六個小時」），大多昏迷不醒（秦四爹欲懲罰者）卻無一死亡（要償命不劃算），最巧是秦四爹的心上人毫髮無損，還能「無聲地」走到搶救者身後「輕聲」說話，如此拿捏精確、料事如神，孔明再世也只能自嘆不如。還有那農家小孩大樹也居然能知道三十多年前的《洗衣歌》歌詞（絕無歧視農民之意——當今城裏小孩亦是無緣得知的），其原由大概就只能作者「由自己的心靈決定」了。至於作者戳向白狗子們最致命的一刀——白狗子找小蜜找著了救命恩人（農民小樹）的女兒，其原因卻是那女孩冒充安徽人——為何要冒充？天知道。大概也就是以此讓白狗子們永遠虧欠農民一筆良心債，在人們面前「用雙手抱著自己的頭，拼命地向地下低去」<sup>51</sup>，讓小說的「批判」題旨得到極盡的「深化」或「升華」。秦四爹是作者至愛的人物，聲稱：「在人格上，秦四爹是個站直了的人。」<sup>52</sup>但這個人格「站直」的秦



四爹，卻實在不怎麼可愛，當年雖然他跟女知青文蘭彼此有意，但他在戰備洞乘女知青睡眠之時未經對方同意而縱情肆意「衝動」，即使不說是「強姦」，也實在不甚光彩；除夕夜帶民兵抓走知青歐陽，只因他教農村姑娘唱《花兒為甚麼這樣紅》；塌方事故，將眾知青性命玩於股掌之中，實難說是正直人之義舉；在知青們回訪過程中那刻意回避的扭捏作態、以及放牛牯滿山衝撞知青，也與正直人格南轅北轍……總之，儘管劉醒龍有「為民請命」之心，但其所作所為，於歷史、於文學、於知青、於農民，都難免有「作偽」之嫌，而絲毫無補於知青文學話語失衡困窘的消解<sup>53</sup>。

在如何描寫知青的問題上，劉醒龍和王彬彬都有頗具「新意」的提法，劉醒龍指責：「以往的知青小說要麼寫知青自己，要麼寫知青眼裏的農民。」<sup>54</sup>王彬彬則說：「迄今為止的『知青』形象都是『知青』的自我塑造。『知青』或許並沒有資格獨自承當對『知青』這一歷史形象的塑造。『知青』哪怕寫下了再多的文字，也只能完成自我形象的一半，而另一半，應由農民來完成。只有當各地的農民寫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知青』形象時，『知青』形象才能說是完整的和真實的。」<sup>55</sup>——我實在搞不懂知青小說寫知青眼裏的農民有甚麼不對，更實在想不通知青小說如何能寫出「不是知青眼裏」的農民。是的，知青作家如前面提到的張承志、史鐵生、鐵凝的作品就有頗多筆墨落在農村與農民上；而朱曉平的《桑樹坪紀事》和《桑塬》、韓少功的《回聲》、李銳的《厚土》等，描寫的主要對象更都是農民和農村。知青作家與作品描寫對象本身確實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距離感，確實就是「知青眼中」的農民和農村，但並不妨礙表達他們對農民和農村的理解、認同以及熱愛與眷戀。至於說知青小說寫知青也成了問題，我就更搞不懂了。知青的自我形象，為何不能由自己塑造？為何怎麼個折騰「也只能完成自我形象的一半」，非得的「各地農民寫出自己心目中的『知青』形象時」（合著農民就可以寫他們眼中的知青，反過來就不行），知青形象方可是「完整的和真實的」？依此類推，老師形象塑造的一半須由學生完成，幹部形象塑造的一半須由群眾完成，作家形象塑造的一半須由讀者完成，抗日英雄形象塑造的一半須由日本侵略者完成……如此邏輯，不是天方夜譚，也該是痴人說夢了。我手寫我口，寫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這本是文學創作的常識，知青作家是老老實實遵循這常識寫作的，王安憶便說：「作品的思想內容很重要，不容忽視。但它也來源於生活，而不是憑空產生的。因此，我寫小說，不是首先去想小說的思想內容，而是只著眼於生活，琢磨著生活。」<sup>56</sup>梁曉聲也坦然承認：「我不熟悉當代農民，不熟悉當代工人，不熟悉當代知識分子，不熟悉當代一般市民，甚至也不熟悉當代20至25歲之間青年，更不熟悉當代幹部階層的生活，我只熟悉和我有過共同經歷的當代『老青年』」<sup>57</sup>，因此，「我的目標是追尋他們的足跡不斷寫下去」<sup>58</sup>。劉醒龍們的理論雖然談不上驚世駭俗卻也當是頗為標新立異的，或許正因如此，才會有如此勇氣毅然「憑空」編撰出自己所未經歷過且不熟悉的有關知青題材的小說。

儘管如此，無論在知青歷史或者知青文學上，提出農民話語權的問題也還是很有積極意義的，廣而論之，跟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有關的各類人，比如運動的決策者、執行者、知青帶隊幹部、知青家人及同學好友等，也都應該行使其話語權，參與討論知青話題。我想這是知青所樂觀其成的，但這樣的可能性有多大？我看誰也不敢說。不過倘若像王彬彬、劉醒龍們那樣偏執於情緒化，就只能使問題進一步惡化而難以得到妥善解決。其實，在知青代群外部的話語失衡問題上，批評的語氣雖然甚為嚴厲，但卻是不甚合乎實際情況的，甚至是言過其實的苛求。從根本上說，知青文學（及歷史）的話語權，始終還須掌握在知青手中（除非知青代群自願放棄——如農村題材的文學，或知青代群成為歷史——如戰爭題材的文學），即塑造知青文學形象（及敘述知青歷史）的主要責任應該是責無旁貸地落在知青的肩上，農民及



其他人的話語，都只能是輔助、補充的性質，而不可能喧賓奪主甚至反客為主。

## 五

在對知青內、外部話語權質疑與非議的同時，批評者的矛頭還進一步指向知青文學的思想言說層面——即懺悔意識的質疑<sup>59</sup>。文壇老前輩韋君宜說：「他們的小說裏，都寫了自己如何受苦，卻沒見一個老實寫出當年自己十六七歲時究竟是怎樣響應『文化大革命』的號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樣變成反對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搶為光榮的？一代青年是怎樣自願變做無知的？」<sup>60</sup>海外知青文學專家梁麗芳說：「知青文學大多寫個人苦難，太少反思自己、反思歷史和自己參與的那段歷史的角色。……寫知青經歷的多，寫紅衛兵經歷的少。這一代人可能不願面對自己以前做過的醜事，形成對歷史的割斷，把同樣的人分割開，變成兩種不同的人，造成一種空白……找不到從紅衛兵轉化到知青的過程，不想回憶，也許是不想寫紅衛兵的心理在作怪，影響到知青文學的深度。」「我希望知青文學有自我懺悔，用歷史眼光來分析自己有甚麼責任，不只是把受苦受難的生活一寫再寫，更不要神聖化理想化。」<sup>61</sup>知青作家張抗抗也說：「臨近二十世紀末，我們這一代人，是不是能夠低頭回首，審視我們的自身，也對我們自己說幾句真話呢？……紅衛兵的法西斯罪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實，已是昨天的噩夢，但有多少人真誠地懺悔過，用心靈去追問我們當年為甚麼受騙上當，為甚麼如此愚昧無知？」<sup>62</sup>

這些批評有個特點：「反思」與「懺悔」兩個概念交混使用，焦點卻是在「懺悔」；而「反思」之意，也往往就是「懺悔」，即要求知青（作家）對自己以往的歷史進行「懺悔」。

「懺悔」的漢語一詞，來自佛教梵語ksama，意謂發露以往之罪以求寬恕並戒惕將來。英語的「懺悔」，大致有兩個意思相近的單詞，一是repent，另一是confess或confession，都有對以往犯過的錯誤或罪行進行供認、悔過之意。羅馬帝國基督教思想家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以及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的同名作《懺悔錄》，其英文的譯名便都是「Confessions」。「confess」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在舊約《聖經》中，「confess」即有「認罪」之意，希臘文的新約《聖經》中有兩個詞homologeō和exomologeō都被譯作「confess」。這兩個詞的主要意思就是「承認自己有罪」，exomologeō的程度更強烈，強調「公開認罪」<sup>63</sup>。也就是說，對自己以往的罪行、錯誤「供認不諱」以求寬恕，是「懺悔」一語的狹義理解。

而在對知青、知青文學批評時所出現的「懺悔」一語，無論是批評者還是被批評者，恰恰都是從狹義上來理解與運用的，如前面批評者所強調的「反對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搶為光榮」，「自己以前做過的醜事」，「法西斯罪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實」；被批評者的抵觸情緒亦基於此，如梁曉聲就辯解道：「當年很凶惡的紅衛兵，只是極少數。大多數紅衛兵……沒打過人，沒凌辱過人，沒抄過別人的家。」<sup>64</sup>

這麼一種狹義的理解顯然是不合適的——尤其是在倡導「全民懺悔」時。對「全民」——包括罪魁禍首、作惡者、脅從者甚至受害者提出同樣的狹義「懺悔」訴求，顯然是難有說服力的。而且，在當下中國「為尊者諱」的政治語境之中，人們被要求「懺悔」——尤其是「全民懺悔」時，往往會產生一種遭受「不公平訴求」的感覺——當文革悲劇的真正原因、製造文革悲劇的罪魁禍首至今仍然受庇護於「為尊者諱」的帷幕下，還有甚麼誠信與理由要求小

民百姓懺悔呢？徐友漁就曾經深有感慨，某些有反思能力和懺悔勇氣的文革參與者之所以抗拒懺悔，便是由於深感「不能暢所欲言地說出一切真話，就甚麼也不說」<sup>65</sup>。甚至可以說，在這種狹義的「懺悔」訴求中，其受益者只能是真正的罪犯乃至製造悲劇的罪魁禍首，文革的策劃者、執行者、害人者將在全民懺悔的「汪洋大海」中陰笑隱遁。狹義的「懺悔」，還往往被心智異常者所利用，將懺悔的省思訴求，置換為行為學意義的指控，如黎學文即由於當年知青所謂的「種種惡行」，要求知青作《知青偷盜史》、《知青械鬥史》、《知青犯罪史》以表示「良心的懺悔」<sup>66</sup>，這種以偏概全的作派，在邏輯上也是荒謬之極的<sup>67</sup>。彭中杰更信口責難：「曾在一夜之間將人類邪惡本能全部釋放出來的老三屆人，從法律的角度來追究，無疑很多人有著犯罪的經歷；可以拍著胸堂自詡清白的人，百分之百是因家庭成份或家長歷史的原因被取消了打、砸、搶的神聖權利。」<sup>68</sup>如此輕率地使用全稱判斷，令人嘆為觀止。

這種狹義的「懺悔」訴求，在中國知青代群中頗受抵觸，「我不懺悔」的聲音此起彼落。當然，「懺悔」訴求之所以受抵觸，除了其過於狹仄的含義外，還或許跟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性本善的觀念有關。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是一個崇尚善良與和平的民族，「人之初性本善」的教誨從小就深入人心，以善為美、向善斥惡的觀念根植社會。在這麼一種民族傳統、社會心理浸淫之下，似乎人人都（自以為）具備善良本性而甚少罪惡感，更無西方基督社會那種「原罪」感。因而人們探尋自己在歷史悲劇中的定位時，所注目的往往就是自身之「善」受欺的哀憫，而相對忽視了自身之「惡」作祟的戒惕；凸顯「善」的動機，而淡化「惡」的後果。於是，以「認罪」為（狹義）內涵的「懺悔」意識在這一片善良的大地似乎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必然性。然而，我們這個崇尚善良和平的民族，實際上卻是長期浸泡於一個百毒俱生的大醬缸。在這麼個大醬缸打滾出來的我們，有誰敢於坦然宣稱自己「出於污泥而不染」呢？畢竟，「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老祖宗早就心有戚戚焉地給我們留下了這麼個古訓。

因此，我們在使用「懺悔」一詞時，雖不必完全承襲其詞源「認罪」的狹義，但也須以道德自律、責己自審為出發點，同時也須更多加入「省思」——即反省歷史、反思自我、呼喚良知、承擔道德責任等更廣博而豐富的內涵。換言之，懺悔的焦點應超逾行為學意義的「認罪」轉向更具理性思辨意義的層面——自己在「文革」那場全民性悲劇中的歷史定位的自我審判，以及道德責任的自我承擔。有人認為，「懺悔」的訴求是為了避免將個人的責任推給社會與歷史。此話固然有理，但倘若只著眼於個人責任而忽視社會、歷史、體制乃至文化的因素，也必然是失之偏頗的。（狹義的）懺悔固然需要勇氣，但省思顯然益見深刻；懺悔立足於個人，亦觀照於個人的具體言行；省思則將焦點從個人言行的懺悔引向深層因果的思考，以及對社會、歷史、體制乃至文化的反省。可見，懺悔當是省思的有機組成部分，懺悔是初步的表層性的，省思才是深刻的實質性的。省思者在省思中對自己在悲劇中的歷史定位進行自我審判並承擔道德責任（知其然），並以此為基礎，進一步省思其更為廣泛深刻的社會、歷史、體制及文化原因（知其所以然）。當然，省思的意識終究還是只產生、存在於省思者主體，省思的動機、行為及效果亦終究決定於省思者的自發、自動、自覺與自主。從個人的角度說，狹義的「懺悔」，只適用於以前做過壞事錯事者身上，而「省思」可適用於更大、以致「全民」——包括盲從、馴順、逍遙、隨大流、明哲保身者乃至受害者甚至是反抗者——的範圍。狹義的「懺悔」，須立足於否定，導向不無消極的自我救贖及獨善其身；「省思」雖然也立足於否定，卻是導向頗具積極意義的「揚棄」，在揚棄中獲得人性的淨化及人格的昇華。

作為知青作家（及非專業作家），其紅衛兵（及之前）的經歷，固然影響了其思想、性格、思維及行為方式的形成，而後者也固然影響、體現於其知青文學創作之中，但是，如果因此就要求在知青文學中不僅要寫知青經歷還要寫紅衛兵經歷，那卻是大不適宜的。無論如何，畢竟還要考慮到「名」與「實」相符——「知青」文學無須總拖一條「紅衛兵」的尾巴。由此可說，知青身份（經歷）與紅衛兵身份（經歷）是有必要區分的，是屬於雖有聯繫卻也有區別的兩個範疇與語境。同理，文革與知青運動、紅衛兵與非紅衛兵（如黑五類）、前紅衛兵與後紅衛兵（1969年後）、紅衛兵集體與個體、老三屆與紅衛兵、老三屆與知青等等，實際上也都是既有聯繫又有所區別的，在知青文學討論中、尤其是知青文學「懺悔」問題的討論中，不宜將這些概念隨意混淆，籠統一概而論。

如果我們不拘泥於「懺悔」的狹義來理解，知青文學中其實一直不乏對歷史及對自身的深刻省思。就從「訴說苦難」的作品來說，其實也正是體現了知青直面苦難重重的人生現實的深刻反思。或者說這也就是知青省思中國現實歷史的起步——不少知青當年正是有了對中國底層農村（以及農、林、牧場和生產建設兵團）苦難的了解、體驗與認識，才從被長期扭曲的「革命人生觀」中醒悟過來，開始了邁出現實中反思的第一步。早期盧新華的《傷痕》、孔捷生的《在小河那邊》、葉辛的《蹉跎歲月》及陸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陽》等便是這類「訴說苦難」的反思之作；後期老鬼的《血色黃昏》、白描的《蒼涼青春》、王小波的《黃金時代》及芒克的《野事》等，以或激烈或平和或戲謔的筆觸，在揭露現實殘酷的社會悲劇之際，還無情剖析了個人荒謬的人生悲劇。孔捷生的《大林莽》、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張抗抗的《隱性伴侶》及陸星兒的《流逝》等，儘管題材風格各異，但也不同程度地表現了作者對歷史的反省、對人生的思考，以及對傳統（革命）人生觀的質疑。鄧賢的《中國知青夢》、郭小東的《中國知青部落》、費邊的《熱血冷淚》以及大批非知青作家撰寫的《知青檔案》、《北大荒啟示錄》、《草原啟示錄》等知青紀實文學作品「從整體上體現出了這樣的主題特徵：站在人類歷史的制高點上，重新反省、審視知青現象，以更加深邃、成熟、理性的現代目光，去反思以前走過的道路，從而折射出知青歲月在人生長河中的深刻影響。」<sup>69</sup>即使是知青專業作家的回憶錄，也大都能突破一己之體驗，具有更大的超越性、涵蓋面以及省思力，真正做到了「沒有沉溺於三十年個人的得與失，而更多的是歷史的反思、人生的體味、對共和國苦難經歷之根源的揭櫫，對民族未來的關懷鑒照。」<sup>70</sup> 80年代中期，張承志在《北方的河》開篇便感慨道：「我相信，會有一個公正而深刻的認識來為我們總結的：那時，我們這一代獨有的奮鬥、思索、烙印和選擇才會顯露其意義。但那時我們也將會感慨自己曾有的幼稚、錯誤和局限而後悔……」<sup>71</sup> 90年代中期，胡發云在《難忘知青歲月》中，則坦陳當年的知青「曾認真莊嚴地幹過許多神聖而荒唐的事」，也「曾從紅色烏托邦的雲端被狠狠摔到冰涼堅硬的現實中」；知青的生活既有「相互間溫暖的關照、豪爽的招待；也有油燈下的苦讀、田塍上的放歌、收穫的歡樂；還有在那些苦難與艱辛中萌生出的惆悵又溫馨的初戀……」，同時亦更有「勞累、困倦、飢餓，包括窮鄉僻壤也不可逃避的政治鬥爭與傾軋，以及為生存而生出的算計、齟齬與紛爭……」<sup>72</sup>

當然，知青文學的省思仍須不斷的深化及拓展，尤其是在省思自己在知青歷史中的角色定位、作用及責任時，仍須更為積極坦率地面對、解剖及揭示。然而，也不應忽視知青文學以往在省思歷史省思自我上所作的努力與成績，更不應輕率地將之全盤否定。同時，在討論知青文學的思想表述問題時，不應陷於狹義的「懺悔」訴求，以致造成不必要的自虐、自傷，從而削弱我們所期望的更具深刻意義的省思力量。



中國新時期的知青文學在風風雨雨中走過了二十多年，有成功也有失誤，有欣慰也有遺憾，有共識也有分歧；記述了一代知青的歷史，抒發了一代知青的情懷，寄寓了一代知青的希望，凝聚了一代知青的精神，體現了一代知青的省思，卻也不可避免地袒露了一代知青的局限。有關知青文學話語的質疑、批評，應是對知青文學局限的反撥，亦當有益於知青文學的發展。然而，倘若批評者採取責備求全、吹毛求疵的態度，及以偏概全、全盤否定的做法，便難使批評起到應有的作用。具體說來，知青文學的話語權，由於的客觀現實的不可更易性，只能爭取運作更合理、更有效，而不可採取絕對平均主義，更不可因噎廢食、釜底抽薪。有關知青文學「懺悔」意識的批評，也應秉持公正客觀的態度，而不宜肆意貶損、無端擴大打擊面。自戀、自憐固然不光彩，自虐、自傷也同樣不足取。游移兩極、矯枉過正，似乎成了我們批評界不自知亦不自覺的「習俗」。至於企圖通過批判的武器或武器的批判來使知青代群集體「失語」、「失憶」，甚至從共和國苦難史中不經意地抹去有關「知青」的一段<sup>73</sup>，那麼，無疑是會愧對蒼天亦愧對歷史、愧對自己更愧對後人的！當然，知青們是不太把這些理論家語重心長的訓誡當一回事兒的，他們是那麼自然地將心中的感受平平實實地表述出來：「這就是我的西里村，這就是我魂牽夢繞的土地。二十多年的歲月讓她離我很遠，二十多年的思念又讓她離我很近。」<sup>74</sup>看這樣子他們是不打算、也不可能會「失語」、「失憶」的了。種種將知青妖魔化、抹黑性的「批評」，似乎並不能起多大作用，畢竟，「曾經滄海，曾經知青！」<sup>75</sup>他們依舊緬懷、依舊訴說、依舊批判、依舊省思，這是基於歷史責任的承諾，也是源自生命靈性的本能。話說回來，文學原本就是極有靈性的話語，知青文學亦當作如是觀。尤其是在當今日益寬容開放的世界中，文學靈性更應得到極盡充分的發揮；而知青文學的話語權與省思意識，也應該得到更為開放、寬容的理解與認識。

## 註釋

- 1 見《北京文學》1998年第6期，頁29。
- 2 郜元寶：〈不斷重寫的知青文學〉，《中華讀書報》，1998年7月15日。
- 3 翁昌壽：〈知青圖書的誤區〉，《中華讀書報》1998年7月22日。
- 4 張嚴正：〈知青圖書開始走出誤區〉，《中華讀書報》1999年1月6日。
- 5 有關該小說，見後文注26。
- 6 包蘭英：〈《老三屆著名作家回憶錄》編後記〉，載賈平凹：《我是農民：在鄉下的五年記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頁180。
- 7 徐友漁：〈知青經歷和下鄉運動——一個體驗與集體意識的對話〉，同1，頁31-32。
- 8 劉醒龍語，見〈熱心冷眼看知青——關於知青問題的對話〉，《今日名流》，1998年第10期，頁6。
- 9 如《北大荒風雲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草原啟示錄》（北京：工人出版社，1991），《青春無悔——雲南支邊生活紀實》（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1），《綠色的浪漫——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紀實》（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知青檔案——知青上山下鄉紀實》（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蹉跎與崛起——五十五位知青的人生道路》（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回首黃土地》（沈陽：沈陽出版社，1992），《難忘鄂爾多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中國知青悲歡錄》（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

- 《漢南情——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寫真》（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老插話當年》（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1994），《我們曾經年輕——武漢知青回憶錄》（武漢：武漢出版社，1996），《我們一起走過——百名知青寫知青》（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滄桑人生——中國特殊群體寫真》（武漢：湖北出版社，1998）等等。
- 10 參看《華夏知青網》中的《知青網站總匯》（<http://www.hxzq.net/zqzmz.htm>）。
  - 11 蟲二：〈留在湖區的女知青〉，《華夏知青網》首頁（<http://www.hxzq.net/x1u/x1u317.htm>）。
  - 12 呼倫河：〈離別三十年，今日回內蒙〉，《華夏知青網》首頁（<http://www.hxzq.net/x1u/x1u325.htm>）。
  - 13 老城：〈我的同學小周〉，《華夏知青網》首頁（<http://www.hxzq.net/x1u/x1u318.htm>）。
  - 14 林子：〈曾為知青〉，《華夏知青網·林子文集》（<http://hxzhq.top263.net/wangyouwenji/linzi/24.htm>）。
  - 15 《老三屆論壇》（<http://sh.netsh.com/bbs/4564/>）。
  - 16 關於民間敘事立場，陳思和有十分精辟的論述，參看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頁363–368。
  - 17 徐友漁：〈知青經歷和下鄉運動——個體經驗與集體意識的對話〉，同1，頁28。
  - 18 王彬彬：〈「知青」的話語霸權〉，《文藝報》，1998年6月4日。
  - 19 王彬彬：〈豈好辯哉：一個鄉下人對「知青」的記憶〉，《書屋》，1999年第5期。（<http://www.monternet.net/reading/html5/26.htm>）。
  - 20 〈『知青』的話語霸權〉，同18。
  - 21 同註19。
  - 22 同註19。
  - 23 見《小說評論》，1997年第3期，頁19。
  - 24 既然劉醒龍不明言，我也不好隨意揣測。但恰恰就在劉醒龍所說的「知青晚會」那個年份，其所在城市隆重推出一場知青演出的大型歌舞晚會，該晚會節目榮獲中國第十四屆全國電視文藝《星光獎》綜合節目二等獎。我想劉醒龍所說的，應當不會是該場晚會吧？——作為專業一級作家的劉醒龍，其藝術品味應該不至於會有那麼令人詫異的「超塵脫俗」。
  - 25 與劉醒龍頗為相知的批評家丁帆即指出：「就我的體驗，在那漫長的插隊歲月中，雖然整天沉浸在悲觀主義的情緒中，但在勞動中與農民結成的那種難以狀訴的友誼卻是終生難忘的，所以在讀《那遙遠的清平灣》時的和諧使我感到親近。」見丁帆：〈知青小說新走向〉，《小說評論》，1998年第3期，頁13。
  - 26 賈平凹的《我是農民：在鄉下的五年記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和李洱的〈鬼子進村〉〔載於《饒舌的啞巴》（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也都有全盤否定知青的言論，但前者在否定、抹黑知青同時，也否定、抹黑農民；主人公「我」，也被處理成一個既是知青又非知青既是農民又非農民的角色；似有懺悔反思之舉，又見自憐自戀之心。後者雖然也咋咋唬唬地否定、抹黑知青，但對知青形象的實際描寫卻頗為中允溫和，甚至表現出知青其實是受欺負者，於是，該小說具有了反諷意味，不僅反諷知青運動，還反諷、解構了（當時及當下）全盤否定、抹黑知青的思潮與做法。因此，這兩部小說跟王彬彬、劉醒龍們的思路大不一樣，故不宜在此一並評析。
  - 27 見《上海文學》，1998年1月號，頁5，6，12。
  - 28 這做法也是其他對知青及知青文學不滿者所喜用，如近期發表在《書屋》2002年第2期第16–18頁黎黎文的〈冷眼看知青〉以及《世紀中國》網站「公共平台」第23期（<http://www.csdn618.com.cn/century/pingtai/index-0105d.htm>）李平的〈放棄「知青情結」，走向澄明境界——中國文化消極沉積層的當代個案分析〉便是如此，只不過黎文的表現

是赤裸裸的非理性叫罵：「我最反感的就是知青這個群體……知青是最虛偽、最矯情；最自戀、最自私的一代人。」李文則是在道貌岸然的外表下宣泄無中生有的惡毒中傷：「（知青）就像無惡不作的少爺、小姐，又象街頭的潑皮，人見人厭，卻自憐自愛。……無知與狂妄、自大與自卑、善於煽情又易於悲觀、身處窘境又毫不知羞、敏於充當『工具』而拙於『旁觀』、永遠自我感覺良好而不知道德、良心、理性為何物。……知青情結猶如爛漫的罌粟，嬌艷、迷人而毒汁四射、遺害無窮。」我始終不明白的是，所有這些咒罵知青及知青話題（包括知青文學與史學）的英雄好漢們，何以會對歷盡滄桑、歷盡磨難而如今大多數依舊在社會底層掙扎求存的知青群體有如此深仇大恨？

- 29 同註27，頁12。
- 30 俞汝捷、劉醒龍〈由《大樹還小》引發的對話〉，《江漢論壇》，1998年第12期，頁64。
- 31 王彬彬在〈豈好辯哉：一個鄉下人對「知青」的記憶〉中曾說：「從人數對比上來說，他們（指知青——引者按）與當地人之間簡直不成比例。但數量對比在這裏毫無意義，就像狼與羊之間的數量對比沒有意義一樣。」顯然，王彬彬是將知青與農民的關係視為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關係，這無疑是說不過去的。詳見下文評析。
- 32 麻卓民：〈放牛娃——「板弓」〉，《華夏知青網》（<http://www.hxzq.net/xlu/xlu320.htm>）。
- 33 老例：〈我的房東〉，《華夏知青網》（<http://www.hxzq.net/wenzhai2/wz54.htm>）。
- 34 叢玉文：〈大山的渴望〉，《知青年代》（<http://www.shuku.net/nove1s/baogaowenxue/zqnd/zqnd.html>）。
- 35 柏萬青：〈我欠老表一餐飯〉，《知青年代》（<http://www.shuku.net/nove1s/baogaowenxue/zqnd/zqnd18.html>）。
- 36 西北狼1號：〈我和張大伯最好〉，《華夏知青網》（<http://www.hxzq.net/xlu/xlu111.htm>）。
- 37 南國嘉木：〈山民篇之一：村姑華姐〉，《老三屆》（<http://bj3.netsh.com/bbs/109299/messages/5884.html>）。
- 38 春雷：〈回家鄉〉，《承德知青網》（<http://www.cdzhiking.com/huodong/jiaxiang.htm>）。
- 39 王勤：〈草原札記〉，《兵團戰友》（<http://btzy.vip.sina.com/qc/j/qc.j.htm>）。
- 40 老城：〈回延安〉，《華夏知青網》（<http://www.hxzq.net/xlu/xlu242.htm>）。
- 41 號子：〈我們走過平凡〉，《華夏知青網》（<http://www.hxzq.net/wenzhai/zp107.htm>）。
- 42 程美信：〈我記憶中的知青〉，《華夏知青網》（<http://www.hxzq.net/xlu/xlu315.htm>）。
- 43 石城大俠：〈山花祭〉，《知青網論壇》（<http://bbs4.xilu.com/cgi-bin/bbs/view?forum=zhiqing&message=2>）。
- 44 見《華夏知青網》<http://www.hxzq.net/xlu/xlu078.htm>。
- 45 徐友漁：〈知青經歷和下鄉運動——一個體經驗與集體意識的對話〉，同1。
- 46 王彬彬：〈「知青運動」：被忽視與被掩蓋的〉，《今日名流》，1998年第10期，頁13。
- 47 見俞汝捷、劉醒龍：〈由《大樹還小》引發的對話〉，同30，頁64。
- 48 俞汝捷、劉醒龍：〈由《大樹還小》引發的對話〉，同30，頁65。
- 49 沈嘉達《現實主義·鄉村情懷·生命意義——劉醒龍小說解讀》便持此說法，見《黃岡師專學報》，1999年4月，頁35。
- 50 參看劉曉航〈《大樹還小》是一部嚴重歪曲知青歷史的小說〉，《老知青之家·劉曉航專輯》（[http://www.1zqzj.com/new\\_page\\_125.htm](http://www.1zqzj.com/new_page_125.htm)）。青年作家李洱的《鬼子進村》也似乎是運用了這麼個書寫策略，將知青在農村的主要工作「設計」為修築一條百無一用的橋，於是也就使繁雜的農村生活大大簡約化了。
- 51 《大樹還小》結句。同27，頁26。



- 52 俞汝捷、劉醒龍：〈由《大樹還小》引發的對話〉，同30，頁66。
- 53 反而給那些不甘寂寞的文壇「看客」提供了攻擊知青及知青文學的「口實」，如王清淮在其〈永遠的看客〉一文，便煞有其事地非難道：「生活中的白狗子和文學中的白狗子都有共同的嗜好：他們從農村帶回了或大或小的傷痕，以此傲人或自戀，但是，如果深究起來，那傷痕的來歷將十分可疑，而且，他們在農村留給農民的傷痕更大，傷害更深。」（見《作品與爭鳴》，1998年第6期，頁43）。
- 54 見〈熱心冷眼看知青——關於知青問題的對話〉，同8，頁7。
- 55 見王彬彬：〈「知青」的話語霸權〉，同18。
- 56 王安憶：〈我愛生活〉，《人民文學》，1983年第6期，頁110。
- 57 梁曉聲：〈生活·知識·責任〉，《人民文學》，1983年第12期，頁107。
- 58 叢麗杭：〈北大荒的兒子——訪青年作家梁曉聲〉，《黑龍江日報》，1985年2月24日。
- 59 與「懺悔」話題相聯繫的是對「青春無悔」說的質疑，由於篇幅有限，在此暫不涉及；且後者跟知青文學中的理想主義話題有十分密切的關係，擬撰另文專門討論。
- 60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頁114。
- 61 陳駿濤、梁麗芳：〈世紀末中國文壇對話錄〉，《北京文學》，1999年10月號，頁91、92。
- 62 張抗抗：〈無法撫慰的歲月〉，《文匯報》，1998年4月13日。
- 63 參看聆松：〈懺悔與悔改的區別〉，《生命與信仰》，總第1期  
(<http://www.cclife.org/htdocs/cclife.nsf/354d32590a4a5b4485256b42005cb56f/e157766cedf4580f85256b43000716d2?OpenDocument>)。
- 64 梁曉聲：〈我看知青〉，《北京文學》，1998年第6期，頁11。
- 65 〈懺悔是絕對必要的〉，見《中國新聞網·新聞大觀》(<http://www.chinanews.com.cn/2000-07-07/26/36753.html>)。
- 66 見黎學文：〈冷眼看知青〉，《書屋》，2002年第2期，頁17。
- 67 照此邏輯，大可隨心所欲編造《農民（工人、軍人、幹部、學生……）偷盜史》、《農民（工人、軍人、幹部、學生……）械鬥史》、《農民（工人、軍人、幹部、學生……）犯罪史》。
- 68 彭中杰：〈懺悔吧，老三屆！〉，《甘肅廣播電視報》，1998年11月15日。
- 69 王恒升：〈論知青文學向後知青文學的主題演進〉，《濟寧師專學報》，1998年2月號，頁74。
- 70 包蘭英：〈《老三屆著名作家回憶錄》編後記〉，載賈平凹：《我是農民：在鄉下的五年記憶》，頁180。
- 71 張承志：《北方的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7），頁1。
- 72 胡發云：〈難忘知青歲月〉，《老知青之家》([http://www.lzqzj.com/whzq\\_01.htm](http://www.lzqzj.com/whzq_01.htm))。
- 73 一如李平在〈放棄「知青情結」，走向澄明境界——中國文化消極沉積層的當代個案分析〉（見註28）末尾的勸戒：「人類的事情忙得做不完，我們卻仍死守住知青情結，何以面向未來？只有放棄自我才能獲得解放，不放棄知青情結將永遠是它的囚徒。讓死的死去吧，讓過去的過去吧！」一代知青的青春、一代知青的歷史，就由那麼一句灑脫的「死去」、「過去」便打發了？如此說來，「死去」、「過去」的還應該包括文革、大躍進、反右、南京大屠殺……
- 74 西里村：〈那一片遙遠的土地〉，《歲月如歌》(<http://bj3.netsh.com/bbs/115160/>)。
- 75 老例：〈曾經滄海〉，《華夏知青網》  
(<http://www.hxzq.net/wangyouwenji/laoli/laolinesw/laol.htm>)。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期（2002年8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